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

苏新宁

(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摘 要 文章简要回顾了情报学发展的过程与背景, 分析了情报学的学科特征以及发展中尚存的问题, 解析了人们对情报学发展中的一些困惑。并指出, 大数据为情报学发展带来了机缘, 情报学也应在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下承担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此, 文章提出了情报学学科崛起的几点思考: 构建军民融合的大情报观下情报学, 培养国家安全与发展需求的“耳目尖兵参谋引领”式情报人才, 实现情报学教学体系变革和培养模式创新, 扬长避短专注情报技术的研究,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 促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融合发展。

关键词 情报学; 学科建设; 军民融合情报观; 安全与发展情报观

The Ris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u Xinning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 Knowledge Servi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clarifies some of the confusion in its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indicates that big data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This development should undertake it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ing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ris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constructing intelligence studies for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training those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 of “Detector, Scout, Consultant, and Leader” categories wh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reforming the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system and incubating the innovative models, keeping the research focus on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a matter of prime importance”.

Key words: intelligence studi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1 引 言

“情报”源出于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往往对胜败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和平时期, 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聂

荣臻、张爱萍所认为的: 情报工作是“耳目尖兵参谋”^[1]。而作为情报工作者, 应当是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坚忍不拔、忠诚信仰。朱德总司令对情报工作者看法是: “唯有最有学识、最勇敢、最有天才、党的最好同志, 才能做好情报工作”^[2]。然而, 作为培养杰出人才(情报工作者)群的情报学学科, 则

收稿日期: 2018-04-02; 修回日期: 2018-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17ZDA291)。

作者简介: 苏新宁, 男, 1955 年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智能处理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 E-mail: xnsu@nju.edu.cn。

较少培养出杰出的情报人才,在和其他学科的竞争中也多处在劣势,在整个科学发展体系中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边缘化^[3],许多高校的情报学学科被并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工程管理等学科,并逐步走向消失。

为什么培养重要情报人才的学科,沦落到如此境地,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是情报学发展的定位出了问题?还是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思路出了问题?抑或情报学科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和情报工作的严重脱节?也许情报学学科本身就还没有厘清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可反映在外界对情报学学科的认识上。当人们一点都不了解情报学学科时会认为情报学是培养“间谍”的学科,但发现我们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出色的情报工作者时,则对情报学的“情报”产生了怀疑;当细致观察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发现文献服务似乎是情报所的主要工作,转而又认为,情报学是培养文献服务的学科,专门为科技人员查找资料的学科;但随着本学科就业的普遍性,情报学界内外都迷惑了,情报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此没有准确定位的学科如何能够迅速发展。

日本是最为重视情报及情报工作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把情报立国作为国策,实力强大的情报工作促进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科技兴国战略,重视科技情报工作,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各省市和各部委也相继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这些情报所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科技情报工作的促动下,1978年我国第一个科技情报本科专业在武汉大学设立^[4];同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开始招收科技情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5],这些可视为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开始。经历了40年的发展,我国情报学学科获得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尚未达到情报学学科发展的理想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家与社会对情报学又有了新的要求和期待,情报学学科发展必须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的普及,为情报学学科发展带来了契机。国家智库建设战略为情报学、情报工作提供了极佳的实践平台,情报工作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安全与发展下的情报工作,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6],特别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7],为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背景下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正因为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策的引领、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情报学学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良机。如何发展情报学?如何把握这一契机?我们必须根据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重新认识情报学学科的作用和地位,规划情报学学科未来发展目标,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之国策提供急需的情报人才。我们相信,新时代是情报学大展宏图的时代,情报学学科将会得到更加迅速发展。

2 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背景

学科的创立与发展通常涉及这样几个因素:其一,在某个领域、某个范围涉及大量科学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一些理论模型亟待建立;其二,应用领域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需要大量的技术与方法,这些技术与方法需要学科领域的成果来担当,一些应用型的学科也会应运而生或得到发展;其三,学科之间的交叉,也会酝酿出新的学科领域;其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及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会促进新的学科诞生和刺激学科快速发展,等等。情报学作为一个应用型的学科,和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紧密相关,从其诞生和发展的背景可以看到其学科发展是与国家需要、科技进步、社会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前中国连年战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幕僚又带走了大量资源,国家一贫如洗。举国上下,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当时又面对西方国家科技、经济的封锁。为了解决科技人员获取国外科技资料困难,了解分析国外科技发展现状,国家在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8]。可见当时情报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向科学技术领域、向科学家们提供最新国际科技动态,跟踪国外的最新科技成果,解决科技人员获取资料难的问题,等等。因此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许多情报所依然把提供文献、科技动态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

1978年武汉大学率先成立了科技情报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4],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也于同年开始招收研究生^[5]。情报学专业开办的初期,无不

充满着科技文献的元素。缘由：当时科技情报专业脱胎于图书馆学，同样也吸收了当时科技情报工作的功能。所以，情报学学科的创办初期几乎打上了图书馆学、科技文献工作的烙印。可以看到：当时教学和研究中的情报采集实际上是文献采集，情报检索也是文献检索，情报服务最主要的还是文献服务，情报交流也充满着文献交流的内容，等等。所以，早期中国的情报学虽然声称科技情报学，更准确的应该称之为科技文献情报学，因为当时的科技情报工作主要内容是针对科技文献的服务。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定位不准，而是由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科技工作者对情报需求所决定，这种定位是符合国家战略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息“爆炸”的出现，“信息”二字刺激着国内图书情报领域，从而出现了一股改名风，许许多多图书馆学系、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许多“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这个改名也深深地波及情报学学科。一时间，情报学研究几乎被信息所取代，针对信息的研究已淹没了“情报”，情报检索被信息检索取代，情报服务被信息服务取代，甚至连情报学学科的项目都很少看到“情报”二字，学科内部的研究对象的转移，招致学科生存的危机，许多图书情报学系被并入管理类学院，有的学校甚至摒弃了情报学专业。纯粹研究情报及其密切相关领域的情报学已在人们的思维中逐渐淡化，对信息、信息资源的研究已经扩散到情报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199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调整中，图书馆、档案依然保留着本科专业，而情报学本科专业被取消，并与其他4个专业并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4]。

情报学学科发展保留有大量国家需求、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痕迹，如从针对科技文献交流规律的情报学，到面向信息管理的情报学，再到关注网络信息资源的情报学。对此有人说，情报学已经不再研究情报了^[10]，情报学研究出现了偏差^[11]，等等。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学学科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8年情报学学科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1984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的情报学硕士点授予权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1991年我国首个情报学博士点开始招生。1986年前后，我国第一个军事情报学硕士点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招生，该学院于1998年获得了第一

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据不完全统计，经过40年左右的发展，如今已有接近百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拥有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公安学下公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0306Z1）、军事指挥学下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10504）共有硕士点16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20502）拥有硕士点72个；情报学博士点十数家（包括军事情报学4家，情报学8家），还有许多高校在其他学科下设立了情报学博士招生方向。可见，目前虽然情报学本科专业在1998年的专业调整中被并入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除军队、公安院校外），但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从若干个点 to 近百个点，可谓发展迅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

当今，大数据时代来临，情报学学科的发展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智库建设对情报学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寄予无限的希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情报学开辟了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使举国上下重视情报。因此，国家安全与发展视角下的情报学将会成为国家、社会和全民非常关注的学科，情报学学科会随着时代发展再次转型，并且由此成为与国家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学科。

3 对情报学发展的困惑

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学科，情报学的建设与发展尚处在摸索之中；作为一个应用型学科，情报学始终在根据国家、社会需要培养相关人才，学科的发展思路也在根据需求进行不断调整。所以，作为年轻的、应用型学科，并在当前信息技术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会产生困惑，这些困惑需要我们梳理和解惑。

1) “信息”与“情报”如何区分，研究重点如何确立

情报学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服务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但由于情报产生的来源基础是信息，附加以知识和思维产生了情报。所以，情报学界许多时候把信息与情报混为一谈，无论是情报学科的教学，还是情报学科的资助项目，更多地放在了信息上，以致有专家惊呼“中国的情报学培养的人才‘文不对题’”^[12]。所以，当许多人对情报学培养出的学生绝大部分从事非情报工作岗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人们却没想到，情报学教育可能出现了偏差，可能丢掉了“情报”这个“魂”。目前，情报学界对“情报”两字的英文翻译讨论的很多，我认为，不

论是翻译成“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这对学者研究情报学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我们分清情报与信息在情报学学科领域处于什么样一个关系。实际上，情报和信息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通、承继、有时甚至可以相互转换的关系。

情报学是研究如何将信息转变为情报，以及研究所产生情报的具体用途。正如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11]描述的信息与情报的关系就好比矿石与钢材的关系一样。实际上单纯的信息作用是不大的，就像矿石一样，而情报则对制定决策有直接的帮助，就像钢材可以作为制造业的有用之材一样，情报学就是研究如何将“矿石”变成“钢材”的过程。再如，有一信息“天空中有一片乌云”，当你没有乌云和下雨之间关系的知识时，这个信息对你是没有用的。但如果通过天空乌云的信息，借助知识和一定方法分析出还有多少时间要下雨，是大雨还是小雨甚至暴雨的话，这就是情报了。人们可以根据这个情报进行有关决策了，如出门时带雨伞还是不带雨伞，一些货物是否立即移进仓库等决策。

所以，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并非和信息没有关系，而是研究将信息转变为情报的理论、技术、方法和过程，对信息的处理、检索、分析等研究，都是情报学领域的基础，但必须强调的是，情报学研究的重点还是情报，不能用信息完全替代情报。

2) 情报工作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服务还是决策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情报工作起步于文献服务，早期的科技文献服务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今天信息化的社会，信息资源泛在化，文献服务是否还应当被当作情报工作的主要工作？一些学者也对当今情报工作还将重点放在文献工作上提出质疑，并认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偏差。实际上，文献服务是情报工作中的一项基础工作，大量的文献工作也充实了情报工作，如对文献信息的分析处理并上升到情报的过程，这些均属于情报工作的范畴。因此，情报学并不应该将文献工作完全抛开或对立起来，但从情报学学科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重点来看，情报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决策支持上。

3) 情报学培养的人才与情报工作究竟充当“仆人”还是“引领者”

图书情报学科长期以来人才培养通常是瞄准服务型人才培养的，并希望图书情报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做好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助手。因此，在教

学上更多的是对一些文献、信息等查找、处理技能的训练，同时也非常注重服务能力的提升，这样的目标很明显是把图书情报人才按照科学与管理的“仆人”来培养的，疏忽了情报学人才的更大价值。老一辈革命家认为情报工作是“耳目尖兵参谋”，实际上在新时代的科学研究中，情报工作者还应具有科学的“引领”作用。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情报人才，不仅仅具有情报处理分析能力，还需要具有相关专业及多方面知识的能力。例如，进行医学情报分析的情报学家应具备较为扎实的医学背景，分析物理学进展的情报学家应当具备较为全面的物理学知识。只有这样的两栖或多栖人才做出的情报，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更有深入度，做出的科学发展预测和展望才能更加准确和具有更高价值。

鉴于此，情报学的人才培养应当兼具“仆人”和“引领者”两方面人才。即培养出来的情报人才既能够专门置身于助手和相关服务的工作，也能够成为科学的“引领者”和决策管理的“支持者”。

4)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近两年，情报学是否跳出原有一级学科而单独建立一级学科的讨论引人关注。一时间，情报学到底是单独成立一级学科还是继续保持和图书馆学、档案学捆绑在一起的一级学科。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为此《情报杂志》还专门设立栏目展开了讨论。著名情报学家黄长著研究员在谈到情报学一级学科问题时指出，情报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尚存在三个问题^[13]；中国公安大学谢晓专副教授认为，目前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尚不现实^[14]；南京大学袁勤俭教授明确支持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观点^[15]；国防科技大学的高金虎教授认为，中国情报研究应以国家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有必要成为一级学科^[16]；等等。

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是希望情报学学科得到快速和健康的发展。但有时欲速则不达，必须面对现实来设计学科发展。那么情报学学科是否需要脱离现有一级学科，而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人们需要厘清困惑。笔者认为，情报学和图书馆学有着历史的渊源，两者虽然都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但在目前的一级学科框架下，两者作为二级学科发展是有利于两个学科和一级学科发展的。从目前的学科规模来看，情报学尚没有成为一级学科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必须在内涵上向深度发展，外延上向广度发展，树立面向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大情报观，建立与国家安全与发展紧密结合的情报学。具体是否成为一级学科，则是有待情报学的未来发展，真可谓“水

到渠则成，欲速则不达”。

当然，在情报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许多模糊认识，需要澄清，对情报、情报学、情报工作中的许多概念、内容等需要重新认识。包括和平时期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的重点与涵盖领域是什么等，这些都需要解惑和重新认识。

4 情报学的发展机缘与历史责任

情报学是一个应用型的学科，是一个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的学科，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国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都对情报学寄予厚望。大数据时代，对善于利用数据、分析数据，并服务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情报学学科，更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情报学有了更好的舞台。所以，人们应当认清形势、把握机缘，重新定位情报学学科发展目标，认清情报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

4.1 情报学的发展机缘

1) 大数据对情报学带来的发展机遇

进入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已经由实验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向数据分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的转移，对于擅长于文献、信息、数据采集、组织、处理、分析，并提升为情报，服务于决策支持的情报科学，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拥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正如一些专家所述：大数据推动了情报工作在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使用和数据服务中呈现了更高的职责要求，这是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拓展和发展契机^[17]。乔晓东研究员等指出^[18]，大数据引发了情报工程化建设，可用工程化模式推动情报理论技术方法的研究、进行情报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情报教育、人才培养。这一观点为情报工作工程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可以认为，大数据就好像是为情报学学科量身定做的科研环境，作为以数据分析、决策支持、情报提供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情报学学科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并利用这个机遇将情报学向纵深发展，向广度扩张。

2)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情报分析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

情报来自于对数据和信息等统计分析后产生的结果，传统的情报产生主要借助于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归纳与演绎推理、聚类与分类的分析方法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挖掘技术的普及应用，融合了传统情报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的情报分析工具应运而生，各种可

视化展现情报分析结果的工具层出不穷，使情报的呈现形式多样化。可以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对情报分析技术的演进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情报分析技术上升为整个应用领域的横断分析技术有了保证，就如情报学中的引文分析已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科技管理与规划领域、科学学领域等多个领域的一项重要分析方法与工具一样。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情报分析技术的融合，将会促进情报分析技术向其他领域扩张，使情报学逐渐成为类似横断科学的一种学科，从而带来情报学学科快速发展。

3) 人工智能水平保证了情报更加名副其实

信息技术发展下的情报分析本质还是数据之间的关系分析，加上呈现情报结果方式的丰富多彩，显著提升了情报展现能力和情报的显性价值。但这样产生的情报仍然建筑在数据的关联上，缺少人的即时思维融入情报分析之中。目前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机器思维”与数据分析紧密关联，可以灵活的发现数据微小变化、数据拐点、环境对数据的影响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再加上大数据和机器的思维能力，保证了情报分析的准确度，展现了情报可能随着时空的变化趋势等。所以，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为情报的深度加工分析打下了基础。因此，未来智能化的情报技术将成为情报学领域新的增长点。

4) 国家智库建设战略为情报学教育指明方向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9]，《意见》特别指出，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要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情报学是最典型的培养智库型人才的学科，在国家智库发展战略中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遇。智库战略为情报学教育、情报工作者的培养指明了方向，情报学教育必须适应国家战略，顺应智库发展，积极为国家智库培养和输送高端人才。

5) “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拓宽了情报学的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6]。“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情报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宽了情报学研究的视野，可以认为，国家发展与安全视野下的情报研究与情报工作是情报学领域新的增长点，过去普通高校情报学更注重

科技情报与竞争情报等面向社会发展的情报研究,军队与公安类高校更注重国防军事安全情报,两者较少交集,“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引导两者融合,实现国家发展与安全目标下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国策为情报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6) 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为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使我国情报工作从此有法可依,保证了国家情报工作沿着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轨道开展。《国家情报法》从另一个角度也阐明了我国情报学研究要与情报工作紧密关联,保证在情报法的框架下,开展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学学科建设。《国家情报法》的颁布说明国家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国家对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期待与厚望,这也是情报学学科走向迅速发展的良机,情报学将以此为契机,保证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更加紧密的联系。

除此以外,随着我国情报研究与实践队伍的不断壮大,在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驱动下,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成绩斐然,多所高校将情报学列入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情报教育者、工作者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发展充满着信心。相信情报学已经迎来了大好发展机遇。

4.2 情报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作为一个与国家发展与安全紧密联系的应用型学科,情报学肩负着国家安全、科技、经济、社会历史等发展使命,既有责任也需要有所担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国策下,情报学应树立学科的使命感,担当起学科的责任,促进情报学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1) 学科的使命感

中国针对国家建设的情报工作始于科技情报工作,肩负着振兴中国科技,服务国家建设、工农业生产等重要使命,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情报学,也是围绕着科技情报交流所涉及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即情报实践应用中的情报收集、处理、组织、检索、分析、服务和情报事业发展等所涉及理论、技术、方法及相关体制、机构、设施等研究。今天,中国在各方面均获得了高速发展,已经跨入世界科技、经济、国防等世界大国行列,在这样一种国力

下,在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驱动下,以及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情报学学科肩负着新的学科使命,实现中国的强国梦需要情报学,需要将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学科定位一定要坚守“耳目尖兵参谋”,并在这一框架下拓展到科学技术的“引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这一愿景。

2) 国家安全与发展框架下情报学的责任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情报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国家安全才能保证国家更加稳定快速发展,反过来只有国家发展强大了,才能有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情报工作欲在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情报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方向应进行何种调整?这种调整必须保证情报学能够承担起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学科责任。因此,情报学应把与国家安全与发展相关联的情报实践、情报工作作为重要研究领域,把国防、军事、公安等国家安全类情报与科技、经济、社会与企业竞争等社会发展类情报相融合,建立军民情报融合的一体化大情报学科,确保新的情报学学科担负起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责任。

3) 科学技术发展期待情报学引路

长期以来,情报学培养的人才注重于能够更好地服务科学技术研究,情报工作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支持也主要关注对大量的文献、信息分析基础之上的情报服务工作。所以不论是情报学培养人才的目标,还是情报工作本身,都是把自己放在科技创新与发展的辅助和“后勤”工作上。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的学科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好的发展机遇是情报学“转型”的契机。所以,情报工作不应当只甘于科技工作的辅助和服务(当然,并不是指不做这种辅助和服务),而是应当发挥情报学的情报分析能力进行科学技术发展前瞻分析,实现与战争时期情报工作的“耳目尖兵参谋”相匹配的地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引领”责任。

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各领域的交叉融合,新兴研究领域不断产生。率先进入科学技术某个新领域,有可能把握该领域的制高点。如何发现和寻找新的科学领域,情报学有着独特的能力。所以,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期待情报学成为“引路人”。

4) 政府决策、智库建设需要情报学助力

目前,政府治理、智慧政府、智能政府的概念是为了提升政府的决策支持和快速响应能力而提出

的。智库则是政府之外从事对国家、政府政策研究的机构,实际上智库就是思想的创造者、决策咨询的提供者。作为培养决策咨询能力人才的学科——情报学,应当肩负起向政府决策支持机构、智库等“大脑”机构提供情报分析人才的使命,使他们担负起政府决策和智库建设的重任。情报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情报分析和情报研究,而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作用于决策支持的情报,应该说情报学学科培养的情报研究和情报分析人才是极佳的决策咨询和智库型人才。所以,情报学将成为政府决策支持和智库建设的强大助力。

5 情报学学科崛起的思考

2017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在南京共同主办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21],会上发布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22]。“南京共识”对未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给予了重新定位和新的认识,为未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绘制了新的蓝图,使我们看到了情报学学科大展宏图的愿景,充分感受到了情报学学科将要崛起的浓烈气息。为此,提出促进我国情报学学科崛起的一些思考。

1) 构建军民融合的大情报观下情报学

2017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习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23]。作为与国家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的情报学学科,如何做到军民情报学的融合,如何构建面向军民融合的大情报观框架的情报学,如何科学地架构情报学科、合理地布局学科,这是人们应当认真考虑的。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民用”情报学(科技、经济、竞争情报等)似乎处于相互封闭状态下发展自己,相互之间交流少,渗透少,更谈不上融合。因此,欲待崛起的情报学,必须实现军民情报学从理论到方法的借鉴、融合,逐渐发展形成军民情报学融合为一体的大情报学科。即将军事、国防、公安、科技、经济、决策、社会发展情报融合,建立新的情报体系。

2) 培养国家安全与发展需求的“耳目尖兵参谋引领”式情报人才

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要把握好人才的培养,作为应用型学科的情报学,其人才培养要瞄准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不但注重培养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

的服务型人才,更要重视培养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决策中发挥智囊作用的高端人才。因此,情报学人才培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服务型人才,即开展一般性的情报采集、处理、组织、分析及服务的情报人才,过去我们培养的主要是这方面人才;二是高端情报人才的培养,即成为决策的智囊、成为“耳目尖兵参谋引领”式人才,这方面人才应当成为未来情报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

情报学应用型高端人才是指,不但掌握情报学理论技术方法及相关领域知识,还希望他们具有某一专业领域较深入的知识,如:医学、理学、工学、农学等理工类学科,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的情报人才才可能在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充当“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在相关的科学领域担负科学的“引导”作用。因此,在情报学博士培养中,应注重引入其他学科博硕士攻读情报学博士,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情报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训练和提升,使他们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的杰出情报人才。总之,情报学高端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瞄准:社会发展耳目、国家安全尖兵、决策支持参谋、科技创新引领。使情报学真正成为国家智库、智囊性人才的重要产出源之一。

3) 教学体系变革,培养模式创新

如前所述,目前情报学教育、情报学研究、情报工作等已被“信息”所淹没,致使许多学者惊呼情报学已不再研究情报了,并称之为迷失的情报学。所以,情报学学科需要做出改变。首先要在教学体系、课程体系上做出转变,提升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的情报意识,突出情报观念,注重情报方法。在教学体系方面,注重将情报元素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将情报理论、情报方法、情报过程、情报技术、情报分析等作为核心教学内容,并加强情报实践教学,应当在情报课程体系中,将情报实践作为必修课程,每一位情报学学生必须在有关情报机构进行实习或参与情报工作,确保所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与情报工作实践紧密结合。

在培养模式上,既要培养注重培养服务型情报人才,也要注重培养专业型的情报分析人才。正如“南京共识”中所提到的:积极吸纳和鼓励各学科的优秀硕士或博士进入情报学学科学习,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举,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同进。情报工作者应当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知识,同时具有强大的情报分析能力。情报学课程体系应以情报为主导,充满情报元素,不仅设置通识的情报产生前期的信息

采集、组织、处理、分析、服务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课程,更注重设置培养学生的情报处理、组织、分析等理论技术与方法的课程,培养学生敏锐的情报意识,提升学生的情报素养,增强学生的情报能力。^[22]

4) 专注情报技术的研究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情报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从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情报工作以来,情报学领域对信息技术的关注与日俱升,信息技术几乎成了情报技术的一个代名词,大量情报学学者热衷于信息技术,正如一些学者疾呼,情报学领域在耕别人的地,荒自家的田,在为他人做嫁衣^[24]。情报学学者关注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是一个好现象,但直接去研究信息技术,则扬“短”避“长”,削弱了学科的竞争力。

当然,笔者不赞成专门去研究信息技术,并不是说不研究技术,反而应当专注于技术,即深入研究情报技术,也就是研究有关情报所独具的加工、组织、处理、分析技术,同时研究如何将现有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情报工作中。实际上,现有的信息技术针对情报加工处理分析等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需要情报学领域对有关技术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情报领域。例如,目前信息分析领域出现的许多可视化软件,并不完全适合情报分析,如果将他们应用于情报分析,必须用情报的思维对这些工具进行改造。

5) 将情报学的方法提升至横断科学的方法

情报学是研究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组织、情报产生、情报检索、情报服务、情报交流以及情报系统所涉及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科。情报分析所涉及的许多理论与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同样适用,情报交流、变化的规律在其他学科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已经向数据范式转变,数据科学已经成为冉冉升起的重要科学,作为与数据科学紧密相关的情报学,其理论、技术与方法应当在数据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情报科学应当与数据科学一样成为一种横断科学。

但长期以来,情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基本囿于情报学及一些密切相关的学科内。例如,情报学中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等,它们反映的文献规律、词汇规律、作者规律实际上在社会、经济、文化中也会存在,但却很少有这些学科的研究利用这些定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情报学学者没有把这些规律上升到对社会

现象的普适表达;另一方面,也没有将这些理论积极地向科学领域传播。实际上,反映在文献、信息、数据、情报中的一些规律同样也表现在诸多科学领域中,情报学的科学理论需要在科学领域中广泛传播,既促进情报学在自身快速的学科发展,同时也拓展自己成为一种横断科学理论。

6)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促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融合发展

以国家安全与发展为目标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与情报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也为情报工作增添了法律依据。情报工作的重点应向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转移,这种转移需要提升情报工作现有平台,加强情报机构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以此推动各类情报机构的资源共享。正是由于情报工作重点工作的转移,情报学研究必须紧跟情报工作的发展需要,将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将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融合发展,情报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应当和情报工作机构形成一种联合机制,将情报机构与情报资源机构建设成情报学教育、培养的实践与培训基地,将情报研究的成果直接落实在情报工作的实际应用中。

总之,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与国家发展战略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情报学理论方法具有极大的上升空间,情报科学方法论能够更好地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多个领域,良好的机遇已成为情报学崛起的源泉。

6 结 语

大数据时代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拓展提供了又一契机,《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为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研究提供了法律框架,情报学越来越得到国家、学术界的重视,情报学有了更大的上升空间,情报工作能够活跃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之上。情报学腾飞的机遇到来了、崛起势头呈现了,情报学学者和情报工作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共同努力,加快情报学学科崛起,让情报工作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为年轻的应用型学科,情报学理论研究与理论的应用尚待加强。正如王芳教授对我国(1991—2015)情报学理论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后指出:我国情报学研究对本学科理论的应用、继承与发展不足,原创理论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偏弱^[25]。技术方法需要提升,

情报的理念尚需充实在学科建设中, 在我们的情报教育和情报工作之中不能丢掉“情报”这个“魂”。在目前这一大好机遇中, 作为一个情报人(情报学者、教育者、工作者), 一定要把情报研究与国家安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在学科建设上胸怀国家和人类大计, 促进情报学学科更加繁荣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本刊评论员. 抓紧时机乘胜前进[J]. 兵工情报工作, 1984(1): 1-2.
- [2] 高金虎. 军事情报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133.
- [3] 陈文勇. 情报学理论思维与情报学研究变革[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0, 33(7): 14-17.
- [4] 马费成. 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13(2): 4-12.
- [5] 武夷山. 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议[EB/O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40823.html>.
- [6] 习近平.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J]. 中国监察, 2014(9): 4.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N]. 人民日报, 2017-07-14(012).
- [8] 戴国强. 勇于创新铸辉煌——纪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所60周年[N]. 科技日报, 2016.10.15(第二版).
- [9] 王洪林, 赵冰峰. “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后的反思[J]. 情报杂志, 2014, 33(6): 1-3.
- [10] 包昌火. 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J]. 情报学报, 2007, 26(1): 29-34.
- [11]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 2017, 36(4): 331-337.
- [12] 包昌火, 刘彦君, 张婧, 等. 中国情报学论纲[J]. 情报杂志, 2018, 37(1): 1-8.
- [13] 黄长著. 关于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考虑[J]. 情报杂志, 2017, 36(5): 6-8.
- [14] 谢晓专. 关于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之浅见[J]. 情报杂志, 2017, 36(7): 1-2, 15.
- [15] 袁勤俭. 关于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之我见[J]. 情报杂志, 2017, 36(6): 8-9.
- [16] 高金虎. 从“国家情报法”谈中国情报学的重构[J]. 情报杂志, 2017, 36(6): 1-7.
- [17] 曾建勋, 魏来.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 情报学报, 2015, 34(1): 37-44.
- [18] 乔晓东, 朱礼军, 李颖, 等.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情报工程[J]. 情报学报, 2014, 33(12): 1255-1263.
- [19]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N]. 人民日报, 2015-01-21(001).
- [20] 邓三鸿, 郭骅.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隆重召开并凝聚形成《南京共识》[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7, 7(4): 113.
- [21] 司湘云, 李显鑫, 周利琴, 等. 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战略纵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纪要[J]. 图书情报知识, 2018(1): 122-129.
- [22]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1): 145-146.
- [23] 习近平谈军民融合: 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EB/OL].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01-23) [2018-02-01].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123/c385474-29043923.html>.
- [24] 包昌火. 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J]. 情报杂志, 2011, 30(7): 1.
- [25] 王芳, 陈锋, 祝娜, 等. 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J]. 情报学报, 2016, 35(11): 1148-1164.

(责任编辑 魏瑞斌)